

分析探讨

日本名古屋华侨社区的演变与重建^{*}

——基于现代社区理论视角的研究

张慧婧

(名古屋大学 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 日本 爱知县 4648601)

[关键词] 日本; 名古屋; 华侨社会; 新移民; 社区研究; 唐人街; 文化人类学

[摘要] 论文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根据对名古屋华侨社会活动家的访谈和对“名古屋中国春节祭”的参与观察及与老港口城市横滨、神户的比较, 分析阐述了初期名古屋华侨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新华侨的活跃和“文化象征社区”的构建, 旨在以名古屋为例, 反映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日本华侨社会的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 并借“名古屋唐人街”的构想, 对华侨社区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中图分类号] D634.3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1)04-0031-09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agoya ——A Research Based on Modern Community Theory

ZHANG Hui-jing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agoya University, Aichi 4660804, Japan)

Key words: Japan; Nagoya;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new immigrants; community studies; China tow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Applying a cultural anthropology approach and community theory, the author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local Chinese in Nagoya, compared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re with that in Yokohama and Kobe, and observed the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 and other cultural activities. As a result,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a declining ethnic community can be revived by new immigrants through cultural networking even in a place with a small ethnic population such as Nagoya.

作为拥有680,518^[1]人口的日本最大外来族群, 日本华侨社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了新成

[收稿日期] 2011-04-28; [修回日期] 2011-11-01

[作者简介] 张慧婧(1984—), 女, 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移民、少数民族社区研究、跨国社会网络等。

* 本文系2010年度名古屋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奖励事业的部分成果。感谢导师 Igor Saveliev 先生和香港大学钱江博士在百忙之中对本文撰写提出的宝贵的建设性指导意见, 同时向支持本研究的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及名古屋各界华侨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系作者根据提交给2011年6月在香港召开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会第八届国际会议的题为《日本名古屋地域华侨社区的文化变迁与创新》的演讲稿修订而成。

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新移民大量来日定居,新华侨^①社区的实力不断壮大,成为族群发展的核心力量。目前,关于在日新华侨的研究多侧重对新移民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而针对某一地域的华侨生存实态进行的多维度、深层次的调研可谓凤毛麟角。

在世纪之交的社会学研究中,有一系列关于社区理论思考,但现代社区理论的研究需要我们以动态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2]本文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拟运用社区理论进行论述,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在日本华侨社会演变的大背景下,通过与老港口城市华侨社区构成要素的比较,从历时态视野简要回眸鲜为人知的初期名古屋华侨社区的文化变迁;二是根据对名古屋华侨社会活动家的访谈及对“名古屋中国春节祭”的参与观察,^[3]共时态考察新华侨是如何形成族群网络并构建社区的,意图以名古屋为例反映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日本华侨社会的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本文不仅尝试为当代国际移民与华侨社会研究提供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崭新的视角和分析手法,也试图开辟社区理论研究的新亮点。

一、初期名古屋华侨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

(一) 生成和发展期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起初基于农业生活方式为主导的世界观,以宗族、方言、熟人为纽带结成行会,建立起互助关系。以长崎“唐四寺”为首,日本各地纷纷成立同族、同乡、同业组织,形成早期华侨社会。名古屋的华侨史最早可追溯至日本明治时代、中国的清朝末期。到了昭和初期,“三刀帮”(广东人餐饮业团体、江苏人理发业团体、山东人裁缝业团体)诞生,成为华侨赖以生存的载体和经济活动的核心。帮内成员既是同乡,又是同行,因而产生密切的协作关系和自助努力的思想。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自发性”延伸。中日战争爆发后,华侨被视为“敌国人”,由于名古屋有重要的军需工厂,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当地华侨的监控和排斥,“三刀帮”被强制解散。^[4]

战后,经历了长期民族认同丧失的华侨大力推进组织化,创立全日本华侨代表机构“留日华侨总会”,同时在各都、道、府、县相继设立华侨联合会。在名古屋,各侨团恢复自主性;1948年全日制华侨学校“东海华侨小学”的创设,70年代初华文报纸《爱知华侨报》的创刊等,使中华文化恢复生命力。但就1970年爱知华侨总会(当地华侨最高权力组织)的成立来看,中华文化在这一时期的保存并非像战前那样单纯,而是作为少数族群立足主流社会的一种政治工具以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华侨团体、华侨教育和华文报纸的孕育巩固了名古屋初期中国族群的社会地位,其盛衰之迹正体现出文化的“自觉性”传承。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爱知华侨总会是一个具有高度向心力的组织,维系了族群的活力和凝聚力。然而90年代以后,名古屋华侨社区发展却陷入了停滞不前。接下来笔者将运用早期的现代社区理论进行解析。

(二) 停滞期

奥田基于传统民居聚居形态整理出社区的四个构成要素。第一,空间体系,即同一区域内的群居是建构社区的基本条件。第二,设施、环境体系,即要求具备共有的生活设施和良好的自然资源。第三,行动体系,指居民利用地域设施参与当地各种活动。第四,意识体系,即搭建居民间沟通、连结居民与地域社会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意识体系,如“定居意识”、“社区情结”等。^[5]山本在奥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形成和维持所必需的四个功能要素,即社区成员的扩充(人)、生活资源的生产(物)、共同的文化认同感(心)、成员间的社会交往及维系连带关系的

^① 本文中“老华侨”系指1972年中日建交以前,特别是二战前的旅日中国人;“新华侨”是指1972年以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日本的中国人。

组织（行为），他认为社区内部构造包括生活基础和规范意识。^[6]这是基于传统的地域型（群居）社区的思考，更是对不受地理范围界定的网络型（散居）社区的尝试性探究。在此理论框架基础上，笔者拟以中日建交前的旅日华侨为对象，通过与横滨、神户地区的对比，揭示名古屋老华侨社区进入停滞期的原因（如表1）。

表1 名古屋地区与横滨、神户地区老华侨社区的比较

	名古屋	横滨	神户
人（1973年中国人登录者数、主要指老华侨）	少（648人）	多（4808人）	多（7261人）
物（这里指华侨开发或活用民族文化资源而从事的经济活动）	以行帮为媒介的小型商业活动	以横滨唐人街为中心开设店铺	以神户南京町为中心开设店铺
心（精神纽带）	东海华侨小学（1948年创立、1953年停办），《爱知华侨报》（1974年创刊、1981年停刊）	横滨中华学院（1898年创立）、横滨山手中华学校（1898年创立）；《亚洲新闻》（1971年创刊）、《横滨华侨通讯》（1973年创刊）等；春节祭（1986年开始）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1899年创立）；《关西华侨报》（1978年创刊）等；春节祭（1987年开始）
行为（这里指华侨团体）	爱知华侨总会等	横滨华侨总会等	中华会馆、神户华侨总会等
华侨的居住形态	散居在爱知县内	聚居在中华街	散居在兵库县内
社区的分类	网络型社区	地域型社区	网络型社区

资料来源：2009年4月11日对爱知华侨总会会长丁先生的访谈、《大都市比较统计年表》1973年版。

由表1可知：第一，从人口要素来看，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名古屋的老华侨人数远远比不上老港口城市。由于人口规模太小，不可能形成利益互惠与生活维持的社区；第二，从地理、经济要素来看，相比唐人街为居住区和商业中心的横滨、神户，名古屋的华侨居住分散，华商间的互动困难，社区经济基础无法确立；第三，从心理要素来看，对强化文化认同意识起核心作用的华侨教育机构、华文报纸、传统祝祭等未能存留，是名古屋华侨社区由兴盛走向衰退的内在决定因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日本外国人政策的调整，再加上全球化的影响，旅日华侨社会的结构被重新改写，按其人口构成可粗略分三类：一是老华侨占主导地位的“横滨型”，他们以唐人街为集聚点，多数经营中餐馆；二是以阪神地区为代表的“混合型”，即群居的老华侨与散居的新华侨并存，以从事贸易业为主；三是以新华侨为生力军的“东京型”，他们活跃于多方面领域。^[7]

名古屋的中国人口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持续增长（如图1）。农业文明时代的旧移民多为维持生计远渡东瀛，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而工业与信息文明时代的新移民则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谋求更好的发展来到日本，他们对主流文化的适应方式及社区形成特征都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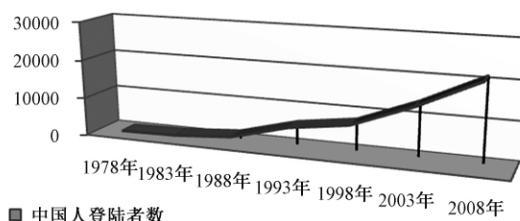


图1 1978年以后名古屋市中国人口的推移
资料来源 《名古屋市统计年鉴》各年版。

然有别于早期移民。最近几年来,新移民问题作为华侨社会研究的新课题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拟以名古屋为例探讨“东京型”华侨社区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共同特点。

二、新华侨的活跃与“文化象征社区”的构建

(一) 全球化进程中社区理论的演变

R. M. MacIver 认为,“地域性”(地理、空间范围)和“共同性”(相互作用、利害关系)是社区的基本特征。^[8]后工业社会的今天普遍出现地域性和共同性游离的现象,社区基础由限定的疆界发展为跨国移民社会空间,可以说网络型社区日益取代地域型社区,受到关注。奥田认为,新一轮中国移民潮促使华侨社区结构模式由唐人街的“飞地”向都市型民族社区转变,集中表现为以社区活动(服务性活动、华侨组织的组建、文化祝祭活动等)为节点和以自发性团体(宗教团体、体育团体、商业团体等)为节点两类。^[9]例如令狐萍列举圣路易斯华人社会的例子,提出了没有华人商业与住宅合一的专门地理区域,而以中文学校、华语教会及华人社区组织为节点的不同于以往唐人街的文化社区理论。^[10]

前文多次提到的“节点”概念,是由铃木在 1957 年提出的。他在《节点机构说》中阐述,节点机构作为生存活动的单位和社会交流的纽带发挥作用。^[11]此后,村山指明节点机构包括职业团体。^[12]迄今为止,节点概念在社区研究上的应用大致分为四类。第一,地域设施。广田以横滨市为例,指出人口集聚形成各式各样的生活世界,基本设施作为节点把不同的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构成都市社区。^[13]第二,商业。根据中野对日本新华侨的研究,华商企业在积累人力、资金、物资的同时,与当地中国顾客建立互动的关系,这对连结同胞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14]第三,社团。王春光通过对荷兰华侨的实地调查,认为华侨社团为侨胞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空间,扮演着“拟村落化”的关键性角色。^[15]第四,文化活动。小林表明,文化活动并非“独善其身”,它是强化社区内部沟通的粘合剂;他还谈到挖掘地域文化来构筑社区的可能性。^[16]下面笔者通过对“名古屋中国春节祭”的考察,探讨新型华侨社区的节点。

(二) 春节祭和名古屋华侨社区的重塑

首先需要明确笔者选择通过春节祭解析华侨社区的理由。大桥指出,少数民族已成为全球化、跨国化的当代都市重要的构成要素,节日庆典和祭祀仪式通常是族群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17]王维也强调把焦点放在庆典和艺能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她列举日本三大唐人街的实例,分析以春节祭为模型的“新传统祭典”的再生产有利于促成族群创新与再编。^[18]由此可见,考察文化祝祭是把握族群特征的有效手段。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名古屋新生代中国人的激增,民族企业取得迅猛发展,涌动在“新来者”内心深处的实现价值观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需求及提高社会地位与安定基本生活的社会、经济需求日益凸显。但由于老华侨的影响力已经削弱,导致华侨社区缺少组织核心。2005 年中国驻名古屋领事馆的开设带动了广大侨胞创出新气象。在领馆提出的“团结、合作、发展”的口号下,各业界新侨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 2007 年春节祭活动的举办,使名古屋华侨社区呈现空前的一体化。

1. 名古屋中国春节祭的发展经纬

春节,即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据笔者调查,“名古屋中国春节祭”的构想由当地华侨率先提倡,并在领馆的后援下付诸实施。2006 年中部日本华人企业家协会、中部日本新华侨华人会、名古屋中华商会、中华饮食文化联谊会、日本中部华侨华人旅行行业协会和爱知华侨协会等 9 个华侨团体自发组成“名古屋中国春节祭实行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一般每年 4 月召开首次筹备会议,以后每月举行讨论;讨论内容包含举办日期、资金筹备、舞台表演、商店展示、动员问题和警备问题等。^[19]名古屋及日本中部六县的华侨以春节祭活

动为契机，扩充人脉网，掀起“凝结侨心、汇聚侨力、发挥侨智”的新高潮，激发了华侨社区的潜能。到2011年，组委会的构成团体已增至14个。^[20]首届春节祭的筹办资金全部来源于侨胞以个人或团体名义的自发捐款，此后每届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当地企业的赞助，其次是侨团、侨商及中日友好团体等出资。这些资金主要用于网页制作、会场布置、广告宣传、舞台表演和事务运营，还包括交通费和膳食费等。^[21]自第二届起，春节祭的活动时间由原来的两天延长至三天，活动形式也在不断充实，涵盖文艺表演和商店展两大亮点（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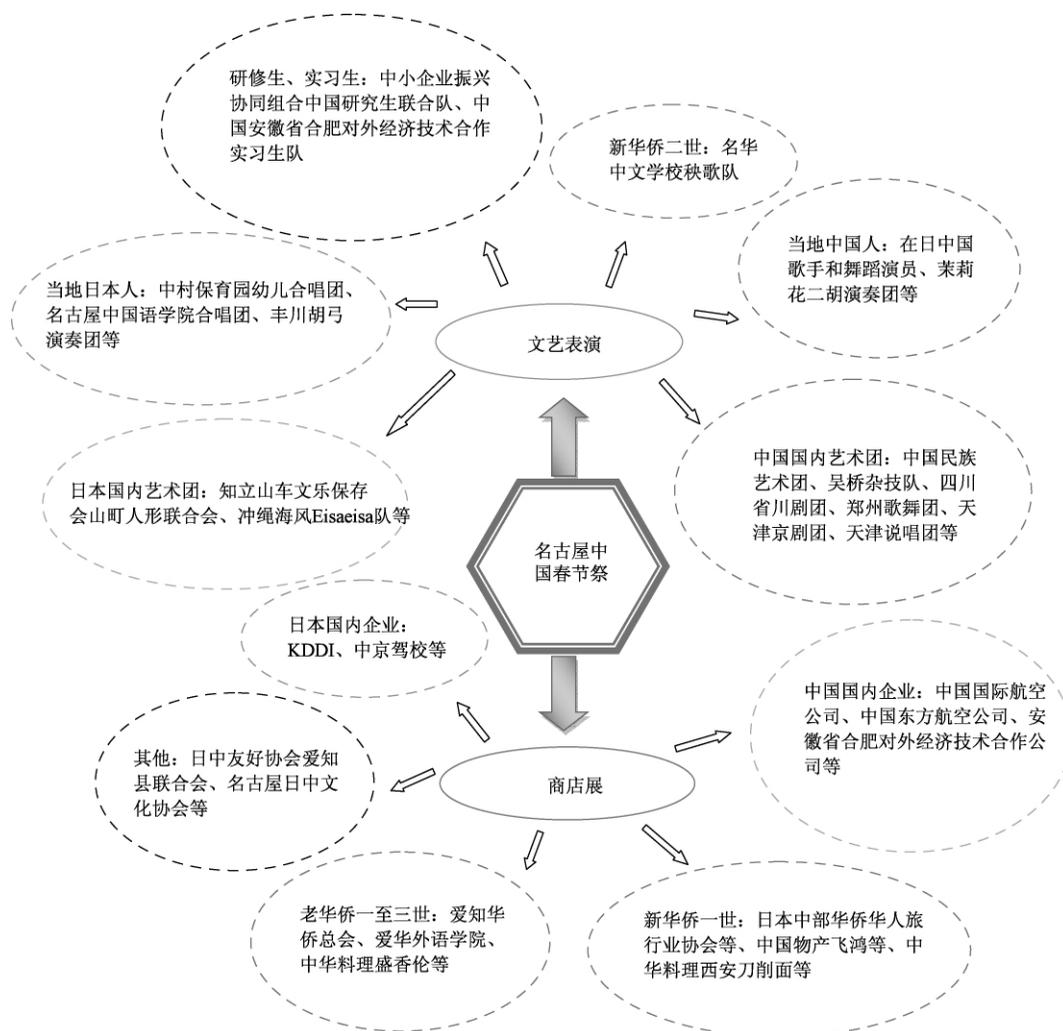


图2 名古屋中国春节祭的构成内容（2010年）

资料来源：2010年“名古屋中国春节祭”宣传海报。

春节祭由新华侨团体联袂主办，毋庸置疑，新华侨一世是主要承担者。值得一提的是，如图2所示，操演狮子舞和龙舞的研修生、技能实习生志愿者和表演“东北大秧歌”等民族特色舞蹈的新华侨二世也是重要群体。此外，老华侨的参与也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再加上协助会场导游和清理工作的留学生的加入，我们确信春节祭对名古屋地区各领域、各阶层的中国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让远离故乡、置身异邦的同胞体验到“回乡”的气氛。另外笔者还了解到，组委会实施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一方面走进日本，既搭建了当地市民了解中国文化的舞台，又增加了华侨接触日本文化和企业的机会；另一方面走向国内，邀请国内歌舞团、杂技团等前来助阵，或提供国内新旅游路线以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其中。^[22]因此可以说，春节祭不

仅打造了名古屋华侨的国际化人脉平台，也加深了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和民间交流。

2. “文化象征社区”模型的提出

提及文化对认同的影响，华人学者余英时认为：文化对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23]正如加贺美在描述旅居匈牙利的德国移民时所写的那样，传统文化与人们的归属意识紧密联系，是少数族群存续的关键因素。^[24]张玉玲指出，日本华侨通过“文化象征”——视觉象征（唐人街等建筑物）、仪式象征（春节祭等庆典活动）、解释象征（博物馆）和育成象征（华侨学校）来呈现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仪式象征作为精神层面的纽带，比视觉象征更有力地强化华侨在当地社会的自我认同。文化象征的创造活动不但可以积聚华侨社区的凝聚力，而且有经济、社会效益。^[25]船津卫、浅川达人提到，社区（community）不仅存在于物理环境（物质世界）中，也存在于“象征的世界”（a world of symbol）和“意义的世界”（a world of meaning）里。^[26]所谓社区活动场所也包括那些不受地理区域限制的、以亲密感和依附感为意义中心的“场所”。

如图3所示，“横滨型”传统华侨社区表现为群居型特征，唐人街是凝聚地。而散居的名古屋华侨则以新创出的中国传统节庆活动为中心提高凝聚力。“春节祭”这一仪式象征的存在，使名古屋的华侨在身份上和文化上找到归属感，进而维系族群认同，开创了社区一体化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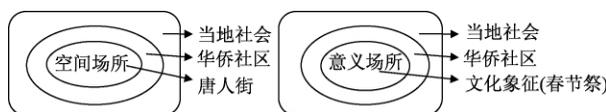


图3 传统的地域型社区（横滨型）（左）和新型文化象征社区（名古屋）（右）

资料来源：王维《日本华侨传统的再编和少数民族》及笔者的实地调查分析。

爱知华侨总会会长丁氏就春节祭对融合新、老华侨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春节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在名古屋地区举办春节祭这样大规模的文化活动，有史以来是第一次。如何把春节祭办好，就成了所有华侨共同的努力目标，我们老侨是带着民族自信和自豪感参与其中的。爱知华侨总会作为名古屋华侨社区唯一的老华侨团体，积极协助新侨，向他们介绍经验，这就促使新老侨之间实现了和睦相处。”^[27]

春节祭的舞台负责人，日本中部中国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聂氏谈到：“记得首届春季祭的时候，我们四处拼命找演员，但是这两三年来，许多当地侨界的艺人慕名而来，主动报名参加演出。”^[28]可见，春节祭激发了华侨展现自身新风貌和中华文化内涵的热情，使侨胞的民族意识日趋增强。

中国传统节庆的再现，不仅促进了侨胞精神文化方面的联系，也使华商间在物质方面进行交流互动（比如推出介绍传统美食、中国物产、旅游胜地的摊点等）。关于华侨社会文化秉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孙谦指出，文化和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随华侨社会的发展，同时进化。^[29]吴潮、赵晓兰也表示，海外华侨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推动了经济成长。^[30]据笔者了解，名古屋春节祭招募赞助商和店铺的海报通常每年7月面向公众发行，除了华侨业缘团体外，更多活跃在各界的华商也以此为契机，结成信赖关系，建立人际网络，从而为整个华侨社区的发展奠定牢固的物资基础。由此可见，春节祭的举办实现了文化和经济的双丰收。

名古屋没有像横滨、神户、长崎那样的集中居住生活的华埠街区，举办春节祭这样的大型活动，可谓开创了先例。这是侨界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侨团发挥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高桥论述到，社区是结构化的集合体，被社区所涵盖并为有机活动注入活力的是社团。^[31]社团是指有着某些共同关切和目的的人为达成特定目标相聚而成的社会组织，本文中的社团主要指名古屋春节祭实行委员会的构成团体；它们被看作华侨社区的基石和支撑点，在春节祭活动中担负起组织人力和物资的重任。综上分析，可以说重塑的名古屋华侨社区是以华侨社团为支柱，以文化象征

(春节祭)为精神纽带的新型华侨社区。

3. 名古屋华侨社区与地域社会关系

移民在建立族群社区的过程中采取革新和融合的态度,将确立生活基础和提高社会地位作为目标,他们的努力、上进心及其精力充沛的文化传播成为移居国(地域)活力的来源。^[32]在全球化和地域化交互影响的背景下,名古屋的华侨既适应当地环境(克服语言关,学习工作技巧、生活常识等)和文化氛围(新年参拜神社、举行赏樱花会等),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又重视建设民族共性、弘扬民族个性,如创办民族企业、组建华侨团体等,实现“中华化”与“在地化”的融合。尤其是春节祭的“形象塑造”,成功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侨社会的创造性转换和现代化意义;同时也展现了异国情调,为名古屋带来新鲜气息,增强了地域社会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有效带动了整个地域社会振兴的气氛高涨。

白水对夏威夷“冲绳节”的研究,阐释了社区内在文化向地域共有文化转型的可能性。^[33]近年来,伴随着日本少子高龄化、全球化的趋势,新生代移民大批涌入日本,各种新族群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寻求建立文化多元共生的社会。2005年“爱知世博”和“中部国际机场”两大事业成功以来,处于时代转折点的爱知县制定了“构建多文化共生社会”的方针政策。中国人族群作为构成文化多元社会的最大外国人群体,如何与当地民众和谐共处显得尤为重要。每年定期举办的春节祭活动架起了名古屋民众与当地中国人亲密接触和相互沟通之桥,中华美食(味)、中国式纸牌坊(色)、传统文艺表演(感动)等,让日本民众体验到异国情怀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春节祭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逐渐发展为当地民众共同参与的一项具有特色的文化交流活动,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期待。近年来,地方政府机构对春节祭的大力支持,这种“巧妙地吸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带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结合实际需要进行改良创新,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来”的态势,必将推动地域多文化共生社会的实现。

三、展望与结语:名古屋唐人街的构想

据报道,农历新年日本新华侨在当地筹办春节祭,被认为是“新唐人街”建设的战略举措。2008年名古屋华侨的“唐人街计划”得到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支持,次年“名古屋唐人街推进协会”创立。此后每月一次华侨代表与大曾根商业街的代表会面,就唐人街项目的运作展开讨论。该项目发起人之一、名古屋中华商会会长王氏肯定了唐人街构想颇具“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34]

“第一,天时。2008年日本观光厅设立了2020年访日游客2500万人的目标,在政府‘观光立国’的中长期战略下,以名古屋为首的中部地区着手综合地、有计划性地推动观光事业,并提出‘中部观光远景’的设想。在此形势下,新观光景点唐人街的修建不仅有利于地方产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可以吸引中国大牌企业的投资,进而振兴地方经济。

第二,地利。名古屋位处东京与大阪之间,是日本第三大经济圈的核心城市,连接东西两大都市圈。在名古屋设立唐人街,地理位置方便,因此有可能吸引来自各地的众多游客。

第三,人和。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春节祭已发展成为日本中部地区耳熟能详的文化品牌,受到民间百姓的好评和欢迎,因此创办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气息相结合的‘新唐人街’是极具可行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在名古屋、札幌、仙台和福冈等地打造新华埠的规划已经出炉,却无一不是计划中途受挫。^[35]另一位名古屋唐人街项目的发起人、名古屋中华饮食文化联合会前任会长刘氏就这一点谈到,“唐人街计划虽已启动,但要最终实现并非易事。其中最不确定的要素就是当地居民能否接受。”^[36]

日本三大唐人街是时代的产物,是华侨社区与日本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历经长久磨合逐

渐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的。相比而言，名古屋华侨社区的重塑是以春节祭为原动力，以华侨对文化象征的认同感为纽带，在融入主流社会与保持民族性之间呈现相对平衡状态。唐人街的兴建不仅被看作是观光及商业设施的开发生，也意味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这必然会给当地社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平野认为，外来文化在“传播、呈现”过程中的那些不符合固有文化接受条件的要素将被“拒绝、抹杀”；反之，固有文化一旦选择吸纳新文化要素，就意味着旧平衡发生紊乱，而通过文化统合来恢复新的平衡和活力，总需要经历迂回曲折的过程。总之，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文化不经过固有文化的筛选。^[37]

总体上看，名古屋唐人街的构想同时受到内部要因（华侨素质、社区秩序和文化力等）和外部要因（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当地居民的理解等）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要根据地域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期望接受过滤。因此，唐人街项目的实行必然会历经一个磨合期。

不过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以春节祭活动为契机的文化事业与产业的蓬勃兴起，优化和改善了内部、外部要因，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杨际开指出，外来文化要素被接受的过程是该文化被接受方的文化赋予新的意义和功能的过程；而接受方接受新文化的姿态也意味着固有文化的超越与创新。^[38]不同于老华侨为主导的华埠及日本人经营的中华饮食街，我们期待新移民主导的唐人街给新华侨社区以及名古屋地域带来良好的预期和更多可能性。

日本华侨社会的研究迄今为止大多围绕历史悠久的“三大唐人街”展开，而对人数继东京、横滨、大阪之后位居日本第四位的名古屋地域的华侨研究甚少。^[39]本文回顾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的中国移民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历程，首先概括描述了鲜为人知的早期名古屋华侨社区的文化变迁，揭示出因人口少、经济基础薄弱，特别是没有支撑社区构成体系的精神核心，而导致族群的文化和身份逐渐模糊。

其次，解析了以社团组织为支柱的“春节祭”是连结广大侨胞的情感纽带，也在确立民族认同、推进文化自觉、建立商业关系网和推进地域社会的多元文化共生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名古屋华侨社区的重塑得以实现。笔者将文化创新论的观点与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发展的社区理论相结合，尝试提出分析族群共同体的“文化象征社区”模型。中国新移民社区作为日本社会的新兴势力迅速崛起，其中近年来非唐人街的日本当地城市繁华区的春节活动，成为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本文通过名古屋的案例，探索了日本新华侨研究分析的新模式，同时为社区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 [1] 法务省 《平成 21 年末在日中国人登录者》，<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49970.pdf>。
- [2] 根据题为《关于 21 世纪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视角》的研究报告，2010 年 11 月第 83 届日本社会学大会，发表人为山下祐介。
- [3] 田野调查时间：访谈于 2009 年 3 月至 12 月进行，春节祭参与观察于 2010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进行。
- [4] 2009 年 4 月采访爱知华侨总会会长丁氏。
- [5] 奥田道大：《コミュニティ形成と住民》，奥田道大、副田义也、高桥勇悦编《都市化社会と人間》，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5 年，第 59 ~ 59 页。
- [6] 山本刚郎 《日系アメリカ人コミュニティの研究枠組に関する一考察》，《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紀要》1987 年第 54 期。
- [7] 陈昌福 《日本华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22 ~ 148 页。
- [8] 松原治郎，《コミュニティの社会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年，第 25 ~ 26 页。
- [9] 奥田道大 《現代大都市のエスニック・コミュニティの系譜と諸類型—都市社会学的考察》，《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1994 年第 156 期。
- [10] 令狐萍 《美国华人研究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理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

- [11] 鈴木栄太郎著 《都市社会学原理》，有斐閣，1957年，第310~332页。
- [12] 村山研一：《地域社会と空間の社会的統一》，《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論集（人間情報科学編）》1997年第31期。
- [13] 広田康生：《コミュニティ施設と地域的生活課題の諸相について—横浜市『地区センター』の機能的実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専修人文論集》1992年第50期。
- [14] 中野克彦：《エスニック・ネットワークの新たな展開—在日中国人のネットワークとメディア》，石井由香編《移民の居住と生活》，明石書店，2003年，第293~316页。
- [15] 王春光 《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 [16] 小林真理 《地域に住まう—文化でつながるコミュニティの可能性（特集 文化と住まい—文化セクターと地域社会の協働）》，《住宅59》2010年第7期。
- [17] 大桥健一：《都市社会における祝祭とエスニシティの生成—中国系エスニック・コミュニティを事例にして》，《兵庫教育大学研究紀要（言語系教育・社会系教育・芸術系教育17）》1996年第2期。
- [18] 王維著 《日本華僑における伝統の再編とエスニシティ》，風響社，2001年，第6~9页。
- [19] 2009年9月采访中部日本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孙氏。
- [20] 名古屋春节祭“关于实行委员会”，<http://www.n-cj.com/easyfree3/>。
- [21] 根据第三届名古屋中国春节祭最终收支报告书。
- [22] 根据笔者对2010年春节祭的参与观察。
- [23] 余英时 《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70页。
- [24] 加賀美雅弘，《ハングリーにおける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の社会組織化とその地域的文脈》，《日本地理学会発表要旨集》2002年第62期。
- [25] 张玉玲著 《華僑文化の創出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ユニテ，2008年，第189~193页。
- [26] 広井良典、小林正弥編：《コミュニティ》，勁草書房，2010年，第113~115页。
- [27] 2009年7月笔者采访爱知华侨总会会长丁氏。
- [28] 2009年12月笔者采访日本中部中国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聂氏。
- [29] 孙谦 《文化学与华侨华人经济研究的构想》，《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 [30] 吴潮、赵晓兰 《简论胡志光的文化传承观》，周望森、吴潮、赵向前编《华侨华人研究论丛（2）》，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第45~52页。
- [31] 参见 <http://eprints.lib.hokudai.ac.jp/dspace/bitstream/2115/34579/1/P113-134%E9%AB%98%E6%A9%8B.pdf>。
- [32] 吉原和男 《人の移動と交流—構築されるエスニシティ（特集 移民のエスニシティと活力）》，《アジア遊学》2002年第39期。
- [33] 白水繁彦：《エスニック文化の社会学—コミュニティ・リーダー・メディア》，日本評論社，1998年，第108页。
- [34] 2009年3月采访名古屋中华商会会长王氏。
- [35] 参见 http://www.excite.co.jp/News/china/20091201/Record_china_20091201022.html。
- [36] 2009年9月笔者采访名古屋中华饮食文化联合会前任会长刘氏。
- [37] 平野健一郎 《文化変容》，西村俊一編，《国際教育事典》，アルク，1991年，第625页。
- [38] 杨际开 《国际关系与文化触变论》，《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 [39]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増田 《名古屋地域华侨社会—面向地域共生》，《名古屋学院大学论集（社会科学篇47）》，2010年第1期；张慧婧 《名古屋华侨社会的历史变迁及新型社区的形成》，刘泽彭主编《世界华侨华人研究》（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176页。